

“九·一八”日军入侵海城实录

刘程九

1931年“九·一八”事变，沈阳北大营硝烟未散的第二天，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一枪未放就侵占了辽南军事重地海城。当时县长是孙文敷（斗南），我任公安局督察长。

9月19日清晨，从日本站前（满铁“附属地”）的日军频繁调动及日本“居留民会”在乡军人的武装戒备猜忌的目光中，已显露出这座古城的灾难即将到来。

9时许，县电报局叶省三局长匆匆赶来向孙县长报告：“打往奉天（沈阳）的电报、电话都不通了，据刚由沈阳归海的商人说省城昨夜已被日军占领……”。

城乡沉静，街巷行人稀少。南北大街所有的商号都仍关板闭户，连鲜果店、小食铺都没有开门营业。县府街拐角的素称消息灵通的“吉成福”杂货庄偶而打开一扇闸板，掌柜的、年青的交替探出头又缩回头，窥视街上三三五五的行人，窃窃耳语，莫不面呈惊慌、恐惧与不安。

街谈巷议，悄悄私语不外是：“日军要进城缴械了”、“商民要遭殃啦”、“说不定还要杀人哪”人心惶惶。也有的说：“咋办哪！县太爷该怎么办？瞧着吧！”

9点半，我将所见所闻及从各方面获得的情况，一一向孙县长汇报之后，县长闭目沉思片刻，终于决定下令：“立即召集部属”。各局（队）长、科股长到齐之后，孙县长面带忧伤沉痛地说：“目前局势大家可能知道，现在四面消息断绝，据说奉天城

已被日军占领了。日军蓄谋已久的野心终于得逞。唉！本县也将被接管。”接着他向全体官员宣布：各人暂按职守将经手文牒、账册清理一番即可各自归家；听候通知。然后命令公安局长崔文凯率其全部公安队，携带较好的枪支，暂驻城东20里的山地（现王石乡陈石村东）待机行动。城里可留少许行政警察，以维护治安。最后命令财务局赵立英（瑞严）局长：汇集所有公款，妥为放置。

傍午，接到白衣寺分驻所（与“附属地”交界处，现海城宾馆前）打来电话说：“日本军队和警察都全副武装进城了，还有‘在乡军人’……”孙县长立即令我把县衙正门打开，他一个人正襟危坐在大堂上（除我以外的官员已遣散一空）等候日军的到来，作了接受最大不幸的准备。

日军官兵、警宪、“在乡军人”一行60余人，中午由北门入城，首先沿街张贴出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的“安民布告”，足有两张对开报纸大。然后分4股：3股同时行动分别包围了公安局（县府东院）、公安队大队部（原火神庙街，现震兴东路）、公安一分局（尚王祠北侧）。1股直闯县府大堂，持枪威吓县长。孙县长仪态从容，不动声色，任其四壁搜索。

过午，另外3股日军纷纷携收缴枪械前来，在大院汇合，均报告城内枪械无多。这时随行的一个果子店的商人，不到30岁，是个“中国通”，这次作为日军引导兼翻译，人们遍称“三谷二小”，先用日本话再用中国话大声说：“城外学校还有枪。”指的是张学良创办的玉皇山下的同泽中学，那里有武装校警。日军遂即强令马上送缴。被迫前来用车送枪的人，有的沉默不语，有的暴跳如雷，摔枪大骂：“为什么一枪不放就交枪？”未及三谷翻译，日军便将孙县长和公安局崔文凯匆匆架走，乘马车出北门直奔“附属地”老巢。北门外至白衣寺之间，卡哨林立，警

戒森严，禁止通行。

日军出城后，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纷纷，一些人想要得到一些国难城灾的消息。也有人担心被架走官员的安全。街面一时呈现无政府混乱状态。

下午2时，我去内宅告知县长夫人肖氏：孙县长和崔局长已被日军架走。她听罢只是惊慌，无何主见。我只好顺日军的去迹，前去探听县长的下落。遂只身徒手经日本宪兵队、守备队、日警派出所，直到“附属地”的华商会。素有私交的会长贾博臣（《泰东日报》分社长）才告诉我：“孙县长被胁迫到野炮联队去了。”我立即急奔北炮队。到门岗我写了个“我见县长”的纸条，交给卫兵。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人，他是商人，叫中山，我与其稍有旧识。我说明来意后，他一面指着从炮队大院里驰出的车痕马迹，一面用中国话说：“县长已经坐马车回城了。”

果然，孙县长和崔局长，不到6点已回到县府。县长看到空荡荡的大院，凄零零的大堂，百感交集。刚进内宅，夫人劈头就问：“你看见程九没有？”

“他上哪去了？”孙县长惊奇地问。

“他说去找你。”夫人答。

“上哪找我？北门外都戒严啦。这不是玩命吗？说不定被日本兵给扎死了。”孙县长一时焦急万分。

晚7时，我七拐八绕终于平安归来。简要陈述经过后，急切地询问了县长去野炮联队，是否遭到麻烦。孙县长说：“那里的一个大佐让我协助皇军维持治安，并说官员可以照常上班。我说枪械都被贵军收缴，无法维持治安。那个大佐想了一下说：‘好吧，借给你一些枪。’”（第二天还了几十支收缴去的长枪，枪筒上均用白铅油涂上了记号）。接着，孙县长怆然饮泣地讲了这样一段话：“国破家亡，人民涂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

之下，岂有完卵。我虽身为一县之长，守土有责，奈今人单势孤，徒唤奈何。唉！民众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了。亡国奴的滋味，今天我算尝到了。”说完令我当夜召集士绅及各界人士开会。

9点刚过，孙县长在会上道出了所以不能毅然一走的实情及贸然抵抗的主客观原因，表露出他对在任已近5年的第二故乡的留恋。同时也道出保境安民的决心，诚恳地向到会人士及全县民众保证说：“有我孙文敷在，将尽一切努力，决不让海城民众遭受重大痛苦。”看样子，他对局势、对日军今后似乎要以消极的态度去应付和周旋。与会人士莫不深受感动，同时悲愤交集，有的士绅如辛子香、韩辑五等竟泣不成声。

散会后，秋夜沉寂，听不到烦挠人的秋虫鸣叫，只有孙县长和我两人辗转难眠。深夜，孙县长霍地坐起，沉痛地说：“程九，作为一个人，应该走人的道路。国家已经这样了，苦难迫近眉睫。日本人的凶残为我所久知，我辈不能甘陷水深火热之中，必须坚定救亡图存的决心，在日军铁蹄蹂躏之下，也应自奋抵抗，首先要唤起民众……，但这要付出重大的牺牲。程九，你能知我，你我亦能步调一致……具有此心，方不愧为人。”我连连点头：“斗南，你知我，我知你，甘愿患难同赴。”

海城沦陷后一周，9月25日，孙县长密派公安局长崔文凯赴已撤到锦州的辽宁省政府请命。崔只身匹马经河西直奔锦州，与当时辽宁省警务处督察长熊飞会晤，报告日军人侵情况之后，得到的只是“暂时不动，听候命令”八字的口头指示。不久，锦州也相继沦陷。

孙文敷后调离海城，因“安东救国会”事件，惨遭日寇杀害。刑前高呼“打倒倭寇！”、“中华民国万岁！”

（高嵩整理并根据笔者亲见亲闻有所补充，摘自《海城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